

論文習作

論清中晚期知識份子的新思潮基礎-- 從龔自珍政論文及〈病梅館記〉之「人才觀」談起

林家宇*

【提要】

龔自珍在清政治史上被認為是劃時代的思想家，為治清學者非了解不可的人物，並影響日後思想家無數。其書以詩、詞、文的表現形式居多，內容多涉及政論之文章，而〈病梅館記〉則作為實踐其思想的基準點。本文即以〈病梅館記〉驗證龔自珍的中心思想。龔自珍的思想以《公羊春秋》為主，以實現為目的，形成一個龐大的思想系統。《公羊春秋》之「三世觀」作為進入龔自珍主題思想之關鍵，透過建立了一套「衰世」的思想，配合「變」之觀念，逐步探究。龔自珍認為人才是作為整個國家強盛的基礎，而〈病梅館記〉即是在這樣的觀念下完成。通過〈病梅館記〉探析龔自珍之「人才觀」，進而更了解龔自珍的政治思潮。並透過層層剖析其文，探究其思想的建立與如何有效的對後世有深刻的迴響。

關鍵字：龔自珍、病梅館記、公羊春秋、三世觀、人才觀

一、緒論

十九世紀上半葉，清國祚走向中晚期。曾經轟轟烈烈的康雍乾盛世業已成了昨日黃花，政治社會原本就存在著蠢蠢欲動的潛在問題，終究還是到了不能粉飾太平的地步。暴露出許多急需解決的社會潛在因素，勢必將造成帝國動盪。首先，龐大的人口結構、嚴重的通貨膨脹、層出不窮的民變……等，都揭開了隱藏在盛世下的敗絮。然，甫登基的嘉慶帝卻不急著先處理這些問題，使之如雪球般越滾越大。這樣的情況下，伴隨而來的結果往往是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且使得政治、經濟隱隱有失控的前兆，也連帶殃及民間社會。官僚體系的腐敗顯然必須為此負絕大部分的責任。¹近人樓宇烈在〈龔自珍〉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

¹ 朱維錚在《重讀近代史》直言不諱的說到：「其實自明中葉到清前期，中國內政從未實現『清明』。休說邊疆與底層的危機不斷，即如號稱『盛世』的滿清雍正、乾隆二朝，那表面穩定掩蓋下的社會政治的腐敗黑暗，也早由東南漢學家們不斷揭露。恰在十八世紀末，乾隆帝死了，他的繼承人嘉慶帝迫不及待地打擊帝國首貪和坤，動機且不說，效應卻是捅穿了帝國腐爛至極的黑幕。嘉慶、道光父子都是庸主，都不敢正視經濟表面繁榮與權力絕對腐化二者落差形成的統治危機日甚的現實。」(香港：

中提及：「從十八世紀末以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少數官僚大地主霸佔了大量的土地，而廣大農民則無地或少地，身受地租、捐稅、高利貸的層層盤剝。同時，清王朝官僚統治集團也已腐敗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²朱維錚也在《重讀近代史》中說：「直到清道光朝，滿州朝廷已如馬克思所指的，成為『陳腐世界的代表』。」³頹勢的政況直至清末都無力反轉。

雪上加霜的是，當時正處劣勢的中國，緊接著又面對直至帝國晚年都沒有辦法逃脫的災難——西方強權的虎視眈眈。首先是鴉片戰爭的失敗，朝廷不得不對外國「蠻夷」做出妥協，這樣的妥協也昭示著中國逐漸被動地走入現代化。⁴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迅速轉變之下，先知先覺者龔自珍代表著「革新」一派的知識份子，在此之前就提出帝國需改革。他早在戰爭之前就已經領悟到閉關自守、自我封閉是再不可能了，一味的畫地自限必受外患之苦。事實上，當西方強權前來叩關時，就應該知道西方文明已是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可嘆的是，當時的中國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依然以「天朝上國」自居。⁵也因為這樣的傲慢，導致了龔自珍這樣憂國憂民之學者的不得志，以及日後一連串的悲劇開幕。雖然在被侵略的情況下，卻也迅速的使一些有志之士覺醒。如此以來，不但加劇了中國進入近代的步伐，加速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解體。

歷經了康雍乾盛世的清朝，乾隆晚年帝國由盛轉衰，天朝優勢不再。在內憂外患不斷的情況之下，有感於政治頹敗之氣橫生，知識份子首當其衝。故，在經一連串的變故與壓抑，知識份子勢必重整其學術思潮。對於因政治的不穩定而產生的對上位者統治能力的信心的動搖。因此，具超越性的進步思想家、敏銳的文學家龔自珍在鴉片戰爭前夕就發表以「衰世」為題的「衰世說」政論文，逐漸開始受到重視。他高呼帝國的腐朽，與即將沒落的結果。

中華書局，2012年），頁150。

² 引入洪煥椿：《中華民族傑出人物傳三》，（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9月版），頁98。

³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序第二。

⁴ 參見劉明清主編：《夜讀百年中國》：「……清政府政府在戰爭失敗後自動做出一連串的讓步，……戰後的妥協標誌著中國開始在國際規則中進行遊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頁32。

⁵ 張豈之在《元明清史》中論述到：「（英人律勞卑）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關係。盧坤以應恪守舊制，中國地方官員不與英國官員直接往來為由，拒絕接受信函和直接會面，並要求立即返回澳門。……英國已經十分清楚，只有用武力才能打開中國的大門。」（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頁531~532。

他在〈乙丙之際箴議第九〉是這麼做評論的：

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駟，藪澤無才盜。……，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於要領，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⁶

由於清朝盛行八股文、大興文字獄，使得思想遭受嚴重的打擊。北京大學哲學系編《中國哲學史》對此做了一個解釋：「沒有人才，是由於封建王朝施行各種各樣的高壓政策。……，摧殘了人們的智慧，毀滅了人們的志氣。」⁷的確如此，這也正是龔自珍認為的清代文人之危機，也是帝國傾毀的可能。於是，龔自珍之政論文章，從此開啟了經世致用之學，成為就此之後文風丕變的轉捩點。⁸如：〈明良論〉、〈乙丙之際箴議〉仍深刻的影響後世的知識份子，使之沿著其開創之新的思潮與文風繼續延伸、發展下去。

歷來對「一八四零年」的說法研究不斷，在近代史學者眼中無疑是爭議的時代。有的學者認為鴉片戰爭(1840年)是學術上重要的分水嶺，有的學者卻認為根本是無稽之談。⁹無論如何，龔自珍始終都被認為是一具劃時代性的巨擘，他的影響力在清學術史上是空前絕後的。梁啟超也曾說：「晚清思想的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¹⁰龔自珍真為開創清代中晚期以政論批評現勢之第一人。其所開創的風氣不僅是一般的學術風氣，也是一股政治風氣。而這新開創的風氣的興起絕非一人一時一地之音，能使當代、後世

⁶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6~7。

⁷ 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54。

⁸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提及：「清代學術思想劃分為四個時期，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當正統派全盛期，……而劉逢祿、龔自珍最能傳其學，……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2年)，頁12。

⁹ 蔣英豪：《近代文學的世界化——從龔自珍到王國維》中提及龔自珍的史學立場：「鴉片戰爭(1840年)是清代歷史與文學的重要分水嶺；在歷史上，他是近代史的開端。在文學上，他是近代文學的起點。」(臺北：台灣書店，1998年)，頁3。然而，朱維錚在《重建近代史》卻說：「由『一八四零年線』劃定的古近歷史分野，從開始便顯出不合邏輯。」(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2年)，頁序第一。

¹⁰ 出自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49。

心有戚戚者，必和近代的歷史息息相關，這樣的風氣也代表著一個不一樣的學術環境即將誕生！鮑正鵠在《龔自珍全集》中就一語道破：「一種思想的出現，是一定歷史實踐的產物。……(龔自珍)他的思想就可能反應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的發展，成為新階段的序幕的標誌。」¹¹

龔自珍是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也可說是開先河者，為嘉道年間經世致用之學的實踐者。然而，在如此混亂的時代中，如何能突破八股文、文字獄的藩籬，建立具時代意義性的新思潮基礎？他極為推崇王安石，¹²所以便以之為例，寫文章呼籲清政府做全面性的改革。然，做為一清朝人，究竟憑藉甚麼能如此肆無忌憚的發表其思想？再說，其一傳統的讀書人，如何突破舊時代的限制，成為舊時代的分隔線、新思潮的開山祖師？龔自珍的研究環境圍繞在傳統漢學之下，傳統漢學顯然是以儒家為基礎奠立而成。然，乾嘉之學卻被他視為是「道問學」。作為立足於世的根據，龔自珍接收了劉逢祿《公羊》學經世致用的觀點並大大的發揚之，此時《公羊春秋》一躍成為其學術的中心思想。¹³圍繞在他身邊的必定是困難重重，然龔自珍依然能披荊斬棘，使其極為人所推崇。朱節勤甚至在《龔定盦研究》中誇口道：「吾敢為一語，非跨侈，中華民國革命之告成，龔氏亦頗具一臂之力。」¹⁴更讓人疑惑的是，當時中國社會普遍對外國「蠻夷」不屑一顧，龔自珍何以有如此擴大的胸懷認為是中國內部「人才」應該做改變？而非當時所認為的「意外」？¹⁵這些相關的

¹¹龔自珍：《龔自珍全集》，鮑正鵠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

¹²朱維錚在《重讀近代史》：「(龔自珍)仍是自稱相信王安石變法宗旨的龔自珍言論。」(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頁154。

¹³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自珍以『道問學』作為乾嘉學的批評，是經過深刻的反省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頁39。

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龔自珍、魏源從劉逢祿問《公羊》學，又立足於現實，接過其據經議政的經世思想，大大的發揮，從而成為鴉片戰爭前後經世思潮再起的開風氣者。」(北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587。

¹⁴引朱節勤：《龔定盦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65年)，頁10。

¹⁵勞思光：《歷史之懲罰新編》的論述中明顯看出：「至於鴉片戰爭後中國人對西方人的仇恨，一方面是由『輕視』轉化而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9年)，頁55。藍詩玲(Julia Lovell)《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 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論述：「中國老舊、發臭、沒有基督教與合宜的廁所；中國人直視很無禮；中國人不直視外國人很傲慢，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馬地臣(James Matheson)……與 William Jardine 合開『渣甸洋行』，他把中國人總結為：『這種民族的特色是弱智、貪婪、自大又頑固得令人稱奇……這個奇怪民族的策略，向來是把自己與所有的一切纏裹起來，神秘、看不透……便以堂而皇之地展現排外的神氣。』有此見外國人受中國輕視，並由之引爆對立。」(新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2006年)

問題皆有待深入的研究與討論。

二、以《公羊春秋》建立新思潮之基礎

清國力最強大的時代，乾隆時代的經世濟民之學就有萌芽的起頭。經世的觀念非常之早，在 1801 年的包世臣即著書《說儲》探討這個問題。《說儲》的成書就代表著經世濟民的思想逐步成形，並且龔自珍、魏源早了二十年。然，包世臣的思想在當時並不受重視；再者，其思想並未形成一套體系。¹⁶所以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認為「開啟」和「代表這種新精神者是龔定盦和魏默深。」¹⁷

當然，就梁啟超先生的說法，以清中晚期做為古、近代的斷點，此時最具代表性的知識份子無疑就是龔自珍。無論從政治立場，或是文學的角度，他都是具最權威性的人物。朱奇志在《龔自珍魯迅比較研究》中如此讚譽：

與同時代人相比，龔自珍的確是先知先覺，他的識見的敏感超前至少高出兩個梯級。第一個梯級：當人們還沉醉于乾嘉盛世所分延的祥瑞之中時，龔自珍就以他的敏感和犀利感受到「忽忽中原暮靄生」的衰世，並對衰世作了深刻的症候式診斷；第二個梯級：龔自珍並沒有被衰世所籠罩，而是撥開迷霧，洞見出新世紀的曙光，預感到「天地為之鐘鼓神預言家的自信」。¹⁸

朱奇志讚譽龔自珍對中國的文化進行改造，從「新世紀」中洞見，進而建立一個「新中國」。¹⁹

龔自珍所建立的新思潮基礎即是以這樣的「衰世」哲學為出發點。且從其建立這些的時間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一點，作為後世為何學者稱其為「先驅者」的注解。也正是因為他身於盛世時，卻依然可以一葉知秋的預言衰世似盛世的偽裝：

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

2 月)，頁 38。

¹⁶鄭大華：〈包世臣與嘉道年間的學風轉變〉，《安徽史學》，2006 年 4 月。

¹⁷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3 年 11 月），頁 40~41。

¹⁸引自朱奇志：《龔自珍魯迅比較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04 年），頁 5。

¹⁹借用鄭健銘：《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為之做定義：「古代『中國』——相對鬆散的文化體，……文化傳統建立共同體，近代革命份子高舉『反傳統』旗幟建立『新中國』。」（香港：天窗出版社，2016 年），頁 84。

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治世之不議。²⁰龔自珍寫這些政論文時，為「乙丙之際」。²¹即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年)和二十一年丙子兩年間，距鴉片戰爭還有大約十五年。正身處安逸，何以非要刻劃衰世？顯然的，他認為當時的環境之下已經到了不容樂觀的地步了。他以其獨到的眼光，對政治社會做全面性的瞭解，於是分析出了最壞的結果。他從政治與文學，兩個支撐中國的左膀右臂開刀。在政治上雖然政府依然是清廷，但卻是昏聩如斯。政治陷入糜爛，民生凋蔽。在文學上，更以「日之將夕」形容之。²²經過八股文、文字獄的洗禮²³，文學是一片荒蕪，毫無生氣可言，呈現出寂若死灰的闐靜。然而，作為近代的揭幕人，他對於政治未來的預見性闡發了其敏銳度。這樣的敏感度究竟是如何建立的？

龔自珍曾用「劍」與「簫」表明其平生之志，其中「屠龍功名，雕龍文章，豈是平生意？」²⁴更是一語道破他的人生目標。那他的人生志向為何？文詞中並未點明。然，在「羅襪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卻充分的彰顯了龔自珍氤氳而強烈的意志，²⁵帶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²⁶濃濃氣魄，他表現的越激亢，就越表明社會實況越發的刻不容緩。就因為其雄心壯志，使得他比一般閉門造車的文人更多幾分對政治動向的敏感度。²⁷再加上成

²⁰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6。

²¹《龔自珍全集》中的第一篇第一輯即為〈乙丙之際箸議第一〉，以示其第一篇文章從「乙丙之際」開始全書。之後的論述則以此類推，多在篇名前加注其年代，而乙丙年為最早。

²²《龔自珍全集·尊隱》，頁87。

²³魏曉棟：〈廢八股後考題的變化及對應試者的影響〉提及：「八股文作為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文體，為統治階級籠絡人才，鞏固統治，強化中央集權發揮了重要作用。」(廈門：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2010年)

張國風：《儒林外史及其時代》：「乾隆一朝，文字獄更多。蓄意羅織，捕風捉影，濫殺無辜。」(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130。

²⁴楊柏嶺：《龔自珍詞箋集·湘月》，(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頁138。

²⁵楊柏嶺：《龔自珍詞箋集·湘月》，頁141。

²⁶(明)黃宗曦撰、(清)全祖望補、(清)王梓材、馮雲濠、何紹基校：《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曾提出著名的「橫渠四句」，認為讀書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台北：世界書局，1973年)，383頁。

²⁷呂元聰、葛榮晉《清代社會與實學：Application and Assessment》中詳述其對於清代考據學的看法：「繼康熙年間推崇程朱理學之後，乾嘉考據學又成為清代中葉的學術主流。有人從『實學即經世』這一片觀點出發，認為乾嘉考據學是清代實學的『倒退』或『消失』。如果僅從『經世』實學層面分析，這一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當時的漢學家同清初實學家比，從總體上，他們經世意識確實淡化了。」(香港：香港

就其一生的經歷，二十八歲那年適逢今文經學大師劉逢祿，並師從劉先生。從此找到奠定其新思潮的最根本——《公羊春秋》。

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就劉申受問《公羊》家言。)²⁸

從此拋棄帶有思想枷鎖的考據學，投奔追求以「經世濟民」為導向的今文經派，公羊派。²⁹並以之為其思想的根基，進行對社會的總體改造。在他山窮水盡的時候，突然冒出的柳暗花明，使之豁然開朗。從此龔自珍奉《公羊春秋》為圭臬。³⁰雖然龔自珍師從劉逢祿，卻又於學術中參雜了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念用於治史，最明顯之見論為：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祖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³¹

可見，龔自珍視三世為通古今之「變」。

那麼何謂「三世觀」？龔自珍變形了《公羊傳》的原意，以之作為養分，成就一代思想體系的萌芽。³²以「三世」用來解釋經學，亦用來解釋歷史的發展。所謂三世是：「治世」、「衰世」和「亂世」三個階段，而三世的發展是具跳動性的，「衰世」成為進入「亂世」的跳板，而「衰世」也可以作為回歸「治世」的警惕。最主要的功能為提醒統治者，並期望統治者及早作防範。清政愛民、任用賢臣，期望社會能撥亂反正。在他的理論中，「變」自可被視為核心：「三王之道若迴圈。」³³「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³⁴龔自珍表現最明顯的在於：

物之數括于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匏三變，一棗三變，一棗核亦三變。……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³⁵

大學出版，2000年)，頁241。

²⁸龔自珍：《龔自珍全集·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頁441。

²⁹參考辛金順：〈論清代道光年間的「經世致用」思想——以龔自珍與魏源為研究對象〉，（新竹：玄奘人文學報第五期，2005年），頁199~218。

³⁰參考安安：〈論龔自珍思想對近代中國的啟發和影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08年）

³¹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頁46。

³²陳鵬鳴：〈龔自珍與州學派〉，載於《江漢論壇》，（武漢：江漢論壇雜誌社，1996年）

³³龔自珍：《龔自珍全集·江子屏所箸書序》，頁193。

³⁴龔自珍：《龔自珍全集·古史鉤沉論四》，頁319。

³⁵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王癸之際胎觀》，頁16。

此最終擴及宇宙萬物，形成一種全新的世界觀，並融合了進化觀與循環觀，將原本空泛之《公羊傳》中的三世具體化，成為康有為三世套三世、展轉可至無量世之說的啟蒙。再說，《公羊傳》的一大體系「存三統」，從董仲舒解釋《公羊傳》「存三統」的觀念中，³⁶強化了「變」的意義性與改革依據。實踐了「三世說」，施政須因地制宜。最終，龔自珍對《公羊傳》中的大一統觀念也有其獨特之闡發。在〈明良論一〉中，對於毫無人性的國君對待下臣，採抨擊的態度，主張君臣子民應上下一心：

臣之於君也，急公愛上，出自天性，不忍論施報。人主之遇其臣也，厚以禮，繩以道，亦豈以區區之祿為報？然而禹、箕子、周公然者，王者為天下國家崇氣象，養體統，道則然也。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雖然，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則然，非君上所以律士大夫之言也。得財則勤於服役，失財則怫然慍，此誠廝僕之所為，不可以概我士大夫。然而卒無以大異乎此者，殆勢然也。士大夫豈盡不古若哉？廉恥豈中絕於士大夫之心哉？然而古之織人俗吏少於今者，誠貴有以謀之至亟矣！……，內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為謀，則君民上下之交，何事不成？何廢不舉？漢臣董仲舒曰「被潤澤而大豐美」者，此也。朝廷不愈高厚，宇宙不愈清明哉？³⁷

因此，在最後的激問完全能看出他對於清政府做不到，而王朝又日漸衰敗的無奈。

為了復興清帝國，再見盛世，龔自珍以他的學術開展新風氣——將「傳統公羊春秋三世說」的思想體系再制。³⁸從《公羊春秋傳》走出一條革新變法的路，以撥亂反正，期望在混世中找尋生存之道。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仔細說明瞭這點：

³⁶張端穗：〈董仲舒思想中三統說的內涵、緣起及意義〉說：「新王建朝，必須保留前朝之後，為他們封土建國，允許他們保存原有之制度，以與新王朝並存，這叫通三統(或存三統)。」載於《東海中文學報》，(台中：東海中文系，2004年)，頁59~60。

³⁷龔自珍：《龔自珍全集·明良論一》，頁29。

³⁸王玉華〈清代公羊春秋學張三世變易的歷史思想〉解釋道：「公羊春秋學的三世史觀，是公羊學解說歷史發展的事實，並規劃國家未來藍圖的最好依據，原本只是孔子對於〈春秋〉不同時代的史事，其記載的書法有所不同，以見年遠恩淺，時近隱諱，標明〈春秋〉用辭的不同，藉此隱約其辭，微加諷喻以避禍。」(臺北：輔仁大學，2001年)，頁473。

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龔、魏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沈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故雖言經學，而其精神與正統派之為經學而治經學者則既有以異。……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³⁹

至於為何選擇《公羊春秋》？這可謂是漢學與宋學相互爭鬥之下的產物。知識份子既厭於分析文義，亦不願墮入性理之學。再加上政治目的：其對清政府的狀況可「對症下藥」：其一，是因為此時的知識份子期望從中國傳統的思想中未能尋找解套之法；其二，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傳統書中也只有其論及華夷之辨。不僅擺脫了考據學只專注於傳注，能直求經文，使得其更有創通大義以為經世之用。此觀念降低日後西學之傳入的困難度，突破華夷之變，並成就「中體西用」。影響了日後的學者，如：陳柱、康有為等人。⁴⁰

由於清代的特殊政治環境，直接面臨西方的進步哲學，所以建立一套體系重建中國實乃當務之急。開創者莊存與重在剖析疑義，龔自珍繼承之，並堅持其發揮孔子「微言大義」。⁴¹而龔自珍的代表性，並非其為「公羊派」之首，而是改公羊派之部分論點，把《公羊春秋》推向社會，成為一種武器，支持他去批評時政。自此，《公羊春秋》成為社會批評與變法改制的立論基礎。⁴²首先，它不同於其他公羊春秋派學者，以《公羊春秋》為群經之首，並對之作學術上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他並不把孔子《春秋》當作預言：

民生地上，情偽相萬萬，世變徙相萬萬，世變名實徙相萬萬，《春秋》文成才數萬，指才數千，以秦漢後事，切刷《春秋》，有專條者十一二，無專條者十八九，又皆微文比較，出沒隱顯，互相損益之辭。⁴³

³⁹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91。

⁴⁰參考陳欣怡：〈陳柱《公羊學》的倫理思想研究〉：「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張以《公羊》『三世說』為本，提倡『立憲變法』……，這些晚清知識份子對於西學的看法未必全然相同，但是引進西學，重新評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卻是一致的。由上言之，晚清許多學者已不再拘泥固守中國傳統經籍，而是選擇突破『華夷大防』的桎梏，引進西學。」（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論文，2013 年。）

⁴¹參見 田浩主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頁 296。

⁴²參見鄭任釗：〈龔自珍與清代公羊學風的轉變〉，《中國哲學》第二十六輯，（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10 年），頁 493～536。

⁴³龔自珍：《龔自珍全集·春秋決事比自序》，頁 233。

從上點看來，亦能明確的看到其治史的態度。因此，視《公羊春秋》為歷史觀，而這樣的歷史觀是與經世致用相結合的。並試圖由神秘虛無的「三世觀」做「微言大義」去解釋歷史，找尋這世界的規律，形成經、子皆史的歷史變異觀。⁴⁴

龔自珍的思想無疑是大膽的，但試想理論與其所處環境，關係重大。他面對的是快速衰敗的國家。所以，期望以有系統、有條理的發揮公羊學，以圖救國。其摒棄了常州公羊派那套隱喻的方式論理，使用明示，並肆無忌憚將現實批評與其具特殊性的公羊學理論做結合。卻也使得其學術思想，並逐步成為學術界的主流，更成為晚清思想家批評時政與鼓吹變法的重要立論之依據。尤其戊戌變法的變法者，更是對龔自珍推崇至極，以龔自珍的理論作為自己的立論基礎。⁴⁵

三、〈病梅館記〉對新思潮的重要性

從龔自珍以《公羊傳》立論看來，他認為「變」是最基本的原則，是正常的，是必須的。當時代的輪軸轉動，人類所有的一切沒理由與古人一成不變。當然，變化是為了更能適應生活，用以維持生命與世界的和諧。變，不見得就是背棄傳統。從結論上來看，似乎是悖逆傳統的，但從本質上看來，他們的觀點是一脈相傳的。在《龔自珍全集·尊命篇》中，即包含了這個觀念：「儒家之言，以天為宗，以命為極，以事父事君為踐履。君有父之言，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⁴⁶龔自珍如牛頓所言，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傳統為做為奠基石，變形成就其學術思想。而這樣的思潮更是用在「人」的身上，因為所有的一切主體都是人。龔自珍認為：人，萬事萬物的本體。所有的一切都是人造的，包括這個世界。而這樣的觀點不啻

⁴⁴高瑞泉：《中國近代為意志論思潮研究——天命的沒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9。

⁴⁵參見鄭任釗：〈龔自珍與清代公羊學風的轉變〉說：「（龔自珍）拋棄了莊存與、劉逢祿哪種的隱喻的手法，而大膽地將他對現實的批判、對改革的期盼與公羊學的理論論述直接結合起來。他針對乾隆之後清王朝快速衰退的現實，有重點地對公羊學的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突顯了公羊學對時代的指導意義，促使公羊學成長為社會的主流思想。由此，公羊學逐步發展成為晚清思想家社會批判與變法改制的強大武器。龔自珍的公羊學深刻影響了晚清社會，戊戌變法的推行者們積極地從他那裡獲取思想資源，對他推崇備至。」《中國哲學》第二十六輯，（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493~536。

⁴⁶龔自珍：《龔自珍全集·尊命》，頁6~7。

於挑戰中國傳統的天命觀，但卻並未廢棄傳統的「命」的觀念。看似矛盾的觀點其實包含了龔自珍對「人」的期望。若說〈公羊傳〉作為新思潮的立論基礎，那麼〈病梅館記〉就是龔自珍對於未來人才的一種重視。在他晚年的詩中提及：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⁴⁷

龔自珍認定的人才並非是傳統的讀書人，而是詩中所說的「不拘一格」的人才，而何謂不拘一格？正是所謂會「變」的人。至此，其思想並非補丁，清政府哪裡不好就往那裡補。他的思想就政治、社會、人，三者形成一個思想大體系，相互呼應。

而各式各樣的人才從哪裡來？首先，必須是每個人其自我生命的圓滿與自信。⁴⁸而這樣的信心造就人的「心力」，強調心力的創造性、驅動力、持久性，由此可知心力，其實指的就是意志。李怡在《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做出完美的評論：

從龔自珍到譚嗣同這樣一些懷才不遇的知識份子不得不在質疑、否定傳統之提出自己的見解，以強化自我觀念與自我精神力量的方式來激發生存的勇氣。經由龔自珍的大力提倡，「心力」作為對於人的內在動力的描述成了近代中國知識界的流行概念。所謂「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心之力」。⁴⁹

這其實不是在對抗傳統，他是在對抗清朝政府對知識份子的束縛。龔自珍認為，帝國之所以缺乏人才，也正是因為清政府不停的戕害。不僅僅是八股文使得知識份子被譏笑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⁵⁰且終日只會搖頭晃腦，滿嘴之乎者也，這樣的讀書人在清中晚期多如牛毛。在魯迅的《吶喊》中清楚的刻畫了一名叫孔乙己的讀書人，就是照著當時舊社會所描繪形象：

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的書，吊著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

⁴⁷萬尊嶷：《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台北：中華書局，1978年)，頁182。

⁴⁸黎景逵：《道論--通論孔·孟·老·莊·佛陀·基督之道》：「人可各自取向，開出自我生命的價值。……，生命價值之路雖縱橫阡陌，但走上這條路，卻可將生命價值實現起來，使自我生命圓滿充實。」(香港：明報出版社，2016年)，頁11。

⁴⁹引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台北：威秀出版，2005年)，頁77。

⁵⁰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微子篇》：(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頁243。

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⁵¹

若中國盡是這些引人發笑之輩，憑什麼沒有內憂外患？而文字獄則更是使得知識份子噤若寒蟬，而清政府為了有效控制臣民，對於旗下的官僚體系每位都有嚴格的規範，使得有才能的知識份子久而久之也機械化了。他在〈明良論三〉中提及：

凡滿洲、漢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極速亦三十年。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此今日用人論資格之大略也。⁵²

確實，清政府這樣較容易管理，但當這些讀書人的腦袋已經失去靈活性，再加上沒有營生的功能，甚至連保有自己的能力都喪失了，中國面臨了無人可用的局面，如何抵禦外侮？又談何「改變」國家命運？再憑藉甚麼稱自己為「天朝」？

由此可見，龔自珍以「立人」為國之根本，視清廷對讀書人束縛的形式是使得人才的沒落，為社會的腐化、衰世形成的原因。所以改善人才成為救國於危難中最重要的事。在〈病梅館記〉中，以梅喻人。然，梅具有特立獨行、潔身自愛的象徵，屬於中國特有之審美。其中對清廷取士之描寫以明喻示之，清楚刻畫知識份子如何被摧殘：

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天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⁵³

這段文字不斷強調文人喜歡梅之病態，亦如清政府為了消磨知識份子的銳氣，「以繩天下之梅」。是故，清廷是喜歡「畸形」的知識份子。

〈病梅館記〉與〈乙丙之際箸議第九〉的思想觀念相互呼應。〈乙丙之際箸議第九〉著重在大方向的政治議題，而〈病梅館記〉卻是著眼於政治議題

⁵¹魯迅：《魯迅小說全集》，（台北：新潮流出版，2011年），頁49。

⁵²龔自珍：《龔自珍全集·良民論三》，頁33。

⁵³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病梅館記》，頁168~169。

的核心——無人可用的原因。所以最後龔自珍發出一耐人尋味的結尾：「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不僅訴說其政治理念的雄大，欲就天下知識份子的決心，卻心有餘力不足。卻也變相的告訴世人，即將面對多麼艱鉅的挑戰。合乎其思想，他的思想中總是希望清政府能未雨綢繆，讓有志之士，如自己這樣也是有理想、有抱負之人，能如同王安石般活躍當時政治之舞台，以實現自己的思想。雖然其疾呼如此激昂，可是八股文制度依然沒有被廢除。或許對當時社會並無多大改變，卻漸漸使文人從傳統中覺醒。

四、結論

在龔自珍的年代，正是清朝最驕傲的年代，政治實力達到最頂峰不久。許多文人都沉浸在這個幻象中，唯獨龔自珍還醒著。因為龔自珍的生命是矛盾的，他出身書香門第，卻因為屢試不第一生窮苦潦倒；外祖父段玉裁是古文經學家，然而他卻拋棄了古文經學那一套，毅然決然走向今文經學；生長環境仍處盛年餘暉，他卻在他的文字中抒發他的激情，對社會現況的不安。終其一生，他都在為國家擔憂，從少年寫下無數的政論文，到了晚期即使再有豪氣萬千也不免染上風霜。在晚年的時候，他寫了一首詩回顧他的一生：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聚今朝。⁵⁴

龔自珍的一生是不得志的，常因為其狂盪不羈的個性，被稱為「狂人」；又因為指責時事，被為政者所不容。

然而，儘管他的「遊說」是以失敗收場的。但是他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佔有一席之地的。於是乎，他的思想成為中國新階段的新指標。龔自珍留下的思想更成為後人踏上去的肩膀，儘管他並非傳統古文經學家，他甚至不能稱為經學家，但是他所傳授的學術思想的是無價的。只是當時文人依然不懂，當面臨一個變革的時代，最先願意為帝國解決者並帶有其學術思想體系的為數不少，然而能被重用而成功的卻是少之又少。⁵⁵而他提出了「變」的觀點，給了日後帝國政治的打擊。《易經·繫辭》：「窮則變，變則通。」攻擊了傳統帝制的「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作為鞏固帝位之理論根基。⁵⁶龔自珍的理

⁵⁴萬尊嶷：《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台北：中華書局，1978年），頁144。

⁵⁵龔自珍：《龔自珍全集》，鮑正鵠：「企圖以由上往下的政治改革來變革現實，命中注定要失敗的。」頁，前言14。

⁵⁶阮師桃園於〈龔自珍的文學研究〉，從文學之角度提及龔自珍對傳統帝制理論之態度：

論顯示了傳統帝制理論的腐敗，而後世的學者，諸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就把他連根拔起。⁵⁷而改良過後的思想也依然與龔自珍所提倡之思想有著無比密切的相關性。

五、參考資料

(一)書目

- 1.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2.朱節勤：《龔定盦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65年。
- 3.萬尊嶷：《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台北：中華書局，1978年。
- 4.蔣英豪：《近代文學的世界化--從龔自珍到王國維》，臺北：台灣書店，1998年。
- 5.朱奇志：《龔自珍魯迅比較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
- 6.楊柏嶺：《龔自珍詞箋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
- 7.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2年。
- 8.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3年11月。
- 9.(明)黃宗羲撰、(清)全祖望補、(清)王梓材、馮雲濠、何紹基校：《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台北：世界書局，1973年。
- 10.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編：《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11.張國風：《儒林外史及其時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1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
- 13.勞思光：《歷史之懲罰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9年。
- 14.朱維錚：《重建近代史》，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
- 15.張豈之：《元明清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
- 16.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台北：威秀出版，2005年。
- 17.藍詩玲(Julia • Lovell)：《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 The Opium War :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新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2006

「自珍對於封建時代的統治者長假天、借聖以行期陰謀奪權之私的真面目，用他如喙利筆將之戮穿……以聲東擊西的方式影射當代。」(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頁150。

⁵⁷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然而他們(康梁二人)的維新變法論的最原始或主要部分，還是建築在龔自珍所倡導的《公羊》三世三統之說上的。」頁14。

年 2 月。

- 18.高瑞泉：《中國近代為意志論思潮研究--天命的沒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19.田浩主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
- 20.魯迅：《魯迅小說全集》，台北，新潮流出版，2011 年。
- 21.蔡尚思：《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22.劉明清主編：《夜讀百年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 年。
- 23.鄭健銘：《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香港：天窗出版社，2016 年。
- 24.黎景濤：《道論--通論孔·孟·老·莊·佛陀·基督之道》，香港：明報出版社，2016 年。

(二)期刊論文(以時間順序排列)：

- 1.阮桃園：〈龔自珍的文學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3 年。
- 2.陳鵬鳴：〈龔自珍與常州學派〉，《江漢論壇》，武漢：江漢論壇雜誌社，1996 年。
- 3.王玉華〈清代公羊春秋學張三世變易的歷史思想〉，《「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2001 年。
- 4.張端穗：〈董仲舒思想中三統說的內涵、緣起及意義〉，《東海中文學報》，台中：東海中文系，2004 年。
- 5.辛金順：〈論清代道光年間的「經世致用」思想--以龔自珍與魏源為研究對象〉，《玄奘人文學報》第五期，新竹：玄奘大學，2005 年。
- 6.鄭大華：〈包世臣與嘉道年間的學風轉變〉，《安徽史學》，2006 年 4 月。
- 7.安安：〈論龔自珍思想對近代中國的啟發和影響〉，《濟南職業學院學報》，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08 年。
- 8.魏曉棟：〈廢八股後考題的變化及對應試者的影響〉，《知識經濟》，廈門：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2010 年。
- 9.鄭任釗：〈龔自珍與清代公羊學風的轉變〉，《中國哲學》第二十六輯，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10 年。
- 10.陳欣怡：〈陳柱《公羊學》的倫理思想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論文，2013 年。